



过渡期后农村低收入群体 新内生动力机制培育 ——以国家乡村振兴重点帮扶县为例

张华泉 杨凡

摘要:农村低收入群体作为相对贫困治理主体,在现行兜底型社会政策的帮扶过程中,普遍存在内生导向模糊、内生能力薄弱和内生动力不足的现实困境。过渡期后,全面激发农村低收入群体内生动力已成为常态化帮扶的根本着力点与政策发力基点。基于国家乡村振兴重点帮扶县的现实区情和农村低收入群体的禀赋特质,创新性融合新内生发展理论与机制设计理论,构建新内生动力机制培育的“模式—策略—路径”,即通过“上下联动+内外共生”的新内生动力机制培育模式和“外部激活+内源自发”的联动型动力机制培育策略,在内外生动力机制的混合路径中全面激活农村低收入群体的内生发展动力和发展能力,降低其“福利依赖”效应及返贫致贫风险,为实现乡村全面振兴与共同富裕发展战略目标提供可持续性的内生发展动能。

关键词:过渡期后;农村低收入群体;新内生动力机制;国家乡村振兴重点帮扶县

DOI: 10.13734/j.cnki.1000-5315.2025.0412

收稿日期:2025-04-16

基金项目: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过渡期后’民族地区重点帮扶县农村低收入群体内生动力机制转换及政策调适研究”(24XJY029)的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张华泉,男,四川南部人,经济学博士,四川农业大学经济学院副教授,研究方向为农村区域发展、乡村振兴,E-mail: zhanghuaquan@sicau.edu.cn;
杨凡,女,四川成都人,四川农业大学管理学院博士研究生。

一 问题的提出

我国已全面消除了绝对贫困,但区域间、城乡间和农村内部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仍然突出。为实现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党中央、国务院统筹考虑西部地区 10 个省(市)内各县域的社会经济现状、脱贫摘帽时序和返贫风险等因素,最终确定了 160 个国家乡村振兴重点帮扶县。其中,114 个重点帮扶县集中分布在更具复杂性、特殊性和挑战性的民族地区,占整体帮扶县数量的 71.25%。由于地理条件恶劣、生态环境脆弱、地质灾害频发、经济基础薄弱和基本公共服务落后的发展现实^①,以及自身文化习俗、民族特色等因素限制,国家乡村振兴重点帮扶县仍存在着规模较为庞大的农村低收入群体^②。农村低收入群体在经济收入、生活质量、社会保障等方面与其他农户相比存在显著差距^③。加上自身综合素质较低、生计资源匮乏和风险抵御能力不足,他们极易因个体或区域层面的风险冲击而再次返贫或陷入绝对贫困。如此,可能导致社会收入差距过大、发展不

① 谢昕莹、王小林《乡村振兴重点帮扶县内生发展动力:框架构建、政策特征与提升路径——基于“目标—工具”视角的政策文本分析》,《西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5 年第 2 期,第 1 页。

② 邱峰、杨浩、庄天慧《缓解还是加剧?现代农业产业园建设对农村低收入群体收入不平等的影响》,《中国农村经济》2025 年第 3 期,第 115 页。

③ 汪三贵、周诗凯《构建过渡期后农村低收入人口帮扶机制——脱贫攻坚的经验与对农村低收入人口帮扶的启示》,《华南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3 年第 3 期,第 5 页。

平衡加剧、可持续发展受阻。以农村低收入群体作为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防止返贫的重点关注对象及治理主体,持续开展国家乡村振兴重点帮扶县农村低收入群体的常态化帮扶工作,已成为实现共同富裕的关键任务和难点所在。

党的二十大报告明确指出,“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增强脱贫地区和脱贫群众内生发展动力”^①。2025年中央一号文件进一步强调,统筹建立农村防止返贫致贫机制和低收入人口、欠发达地区分层分类帮扶制度,注重激发内生动力^②。可见,持续激发欠发达地区及农村低收入群体的内生动力已成为常态化帮扶的根本着力点与政策发力基点。农村低收入群体内生动力的激活不仅是防止返贫致贫最根本、最有效的方式,还是缩小城乡、区域和农村内部收入差距的重要手段。然而,在过渡期现行兜底型社会政策的实施过程中,政府帮扶的“福利主义”倾向易导致农村低收入群体产生内生导向模糊、内生动力不足和内生能力薄弱的问题,成为国家乡村振兴重点帮扶县乡村高质量发展的主要瓶颈之一^③。随着五年过渡期的结束,在常态化帮扶治理新阶段,农村低收入群体内生动力持续激发将面临一定的挑战。因此,亟须探索从传统的外部输血赋能为主的动力机制向区域开发、个体自我发展能力提升和角色定位转变的联动型动力机制。

目前相关研究已开始关注新时期的农村低收入群体,在精准识别和科学界定的基础上,测算了农村低收入群体的比例与规模^④,分析其基本生计特征^⑤、增收现实挑战^⑥、内外风险冲击因素^⑦以及对社会发展的消极影响^⑧等,提出农村低收入群体的返贫风险防范构想^⑨,即以可持续增收为主要抓手^⑩,构建农村低收入群体综合帮扶机制^⑪,提高农村低收入群体劳动技能并改善其劳动条件^⑫,增强其内生发展动力和发展能力^⑬,从而扩大中等收入群体规模^⑭,促进农村低收入群体迈向共同富裕^⑮。现有研究为防止农村低收入群体返贫致贫、构建常态化帮扶机制提供了充足的理论基础和方法支撑。但既有研究并未站在过渡期后新的历史方位,也缺乏对特殊区域与特殊群体(国家乡村振兴重点帮扶县农村低收入群体)的“新”问题及“共性”难题(新内生动力机制培育)的研究。

基于此,本文以国家乡村振兴重点帮扶县调研样本为例,聚焦中国式现代化、乡村全面振兴战略背景,系统研究过渡期后农村低收入群体新内生动力机制的培育逻辑、培育模式及培育策略和路径,以期全面提升农村低收入群体的自我发展动力和发展能力,为国家乡村振兴重点帮扶县实现内生可持续发展与共同富裕目标提供理论支撑和政策建议,为相关部门科学制定过渡期后的扶持发展规划提供有益的决策参考。

二 新内生动力机制培育的逻辑机理

(一)新内生动力机制培育的理论逻辑

1. 新内生动力机制培育的理论溯源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为解决乡村发展停滞及粮食短缺的问题,世界各国在外生发展理论指导下,试图依靠外部资本和管理推动农业农村发展^⑯。然而,外生发展理论过于依赖外部力量,导致乡村资源在城市化进程中被过

① 习近平《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团结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2022年10月16日),人民出版社2022年版,第31页。

② 《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进一步深化农村改革 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的意见》(2025年1月1日),《人民日报》2025年2月23日,第1版。

③ 邢成举、宋金洋《共同富裕背景下发展型社会政策与农村低收入人口的常态化帮扶》,《贵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3年第2期,第68页。

④ 高强、曾恒源《中国农村低收入人口衡量标准、规模估算及思考建议》,《新疆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1年第4期,第98—100页。

⑤ 左停、赵普民《结构分类与需求异化:农村低收入人口生计特征与帮扶策略研究——基于西南地区X乡镇农村人口排查数据分析》,《贵州社会科学》2025年第1期,第144页。

⑥ 姜惠宸《农村低收入人口增收:困难挑战与促进对策》,《南京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4年第1期,第87—90页。

⑦ 谢治菊、陈伟彬《“压力—释放”模型下规模性返贫风险的形成与防治》,《人文杂志》2025年第2期,第126页。

⑧ 左停、李颖、李世雄《农村低收入人口识别问题探析》,《中国农村经济》2023年第9期,第5—6页。

⑨ 谢治菊、黄诗雅《从“两线合一”到“两制并轨”:农村低收入人口返贫风险化解构想》,《江苏行政学院学报》2024年第6期,第18—20页。

⑩ 李实、史新杰、陶彦君等《以农村低收入人口增收为抓手促进共同富裕:重点、难点与政策建议》,《农业经济问题》2023年第2期,第15—18页。

⑪ 范和生、郭阳《共同富裕背景下农村低收入人口综合帮扶机制建构》,《中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3年第1期,第149—151页。

⑫ 左停、赵永丽《增强劳动技能与改善劳动条件:农村低收入人口增收路径分析》,《河海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4年第2期,第7—9页。

⑬ 严明义、马文杰《扶贫政策的福利水平效应》,《统计与信息论坛》2025年第5期,第100页。

⑭ 李炜、王卡《共同富裕目标下的“提低”之道——低收入群体迈入中等收入群体的途径研究》,《社会发展研究》2022年第4期,第20页。

⑮ 林闽钢《促进低收入群体迈向共同富裕论纲》,《治理研究》2022年第5期,第6页。

⑯ 苏毅清、邱亚彪、方平《“外部激活+内部重塑”下的公共事物供给:关于激活乡村内生动力机制的解释》,《中国农村观察》2023年第2期,第74页。

度攫取^①,乡村文化和生态环境等资源遭受严重破坏。在此背景下,强调依靠内部力量的传统内生发展理论应运而生。该理论强调技术、创新、人力资本等内部因素的作用,倡导“自下而上”和“由内而外”的内生发展模式^②。但在缺乏外部资源帮扶的同时,乡村难以依靠自身力量改变其走向衰落的趋势,最终也陷入了“桃花源”式的理想主义困境。实际上,“外生—内生”发展二元论代表着两种截然不同的发展路径,均面临着诸多可行性和有限性的理论困局,在实践中也遭遇了一些失败^③。

20世纪90年代,英国学者克里斯托弗·雷(Christopher Ray)提出了新内生发展理论。该理论强调外部资源与内生动力之间的有效聚合与协同转换,并指出乡村可持续发展的核心在于实现由外源驱动为主向内生驱动主导的转变,不再追求传统发展模式中的单一路径,而是在“上下联动”与“内外共生”的混合路径中谋求乡村的整体可持续发展^④。新内生发展理论不仅为乡村发展提供了全新的理论视角^⑤,还为农村低收入群体的新内生动力机制培育指明了一条新发展路径,即新内生发展道路。在新内生发展理论的指导下,农村低收入群体新内生动力机制的培育机理被赋予了科学意蕴,即以外部资源输入为前提,通过“外引促内育”充分激发农村低收入群体的内生发展动力^⑥,从而实现由外部驱动向内生驱动的系统性转变。

2. 新内生动力机制培育的实践指引

机制设计理论指的是在信息不对称、自由选择 and 决策分散的约束条件下,如何设计出一套有效的机制使得个体利益与组织目标一致,从而有效激发参与主体的积极性并达到既定目标^⑦。尽管新内生发展理论为农村低收入群体的新内生动力机制培育指明了方向,但因其缺乏机制研究而难以有效指导具体实践^⑧。因此,在具体实施策略和实践路径构建层面,仍需依托机制设计理论系统构建信息机制和激励机制,从而实现农村低收入群体新内生动力机制的有效培育。

以政府为主导的外部“输血式”动力机制不仅与农村低收入群体的实际发展需求及预期发展能力错配,还加重了政府的财政负担,导致资源利用效率低下,甚至陷入“高外部资源—低内生动力”的现实困境。通过对信息机制的设计与构建,能够显著降低不同主体间的信息获取和传递成本,解决信息不对称和效率低下的问题^⑨,从而实现内外资源的有效配置。此外,在外生式发展模式,农村低收入群体往往处于被动接受地位,普遍存在积极性不足、能动性匮乏的难题,为可持续发展埋下了较大的风险隐患。对此,激励机制设计应结合农村低收入群体的发展需求,采用多元激励手段,以充分调动其参与积极性^⑩。综上所述,机制设计理论通过信息和激励双重机制优化,为农村低收入群体新内生动力机制培育构建了一套系统化、多维度的理论支撑和实践框架。

(二)新内生动力机制培育的历史逻辑

1. 从“运动式”帮扶向“常态化”帮扶的转变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针对农村低收入群体建立健全了多层帮扶体系。范和生、郭阳将我国帮扶机制的历史演进划分为四个阶段:第一阶段为摸索期(1978—2000年),政策目标以解决温饱问题为核心;第二阶段为起步期(2001—2010年),战略目标转向以综合扶贫开发为主;第三阶段为攻坚期(2011—2020年),以精准扶贫战略为导向;第四阶段为常态期(2021至今),以常态化综合帮扶为主^⑪。在脱贫攻坚阶段,我国主要采取政府主导型扶贫开发模式,即通过短时间内投入大量的财政资源和专项政策来解决绝对贫困问题。这种自上而下的运动式帮扶

① 尤海涛《乡村旅游利益之殇与本源回归》,《旅游学刊》2014年第12期,第10页。

② 张奇男、董芹芹《新内生发展模式下乡村体育发展:理论溯源、价值意蕴与行动策略》,《天津体育学院学报》2024年第2期,第191页。

③ Menelaos Gkartziou, Mark Scott, "Placing Housing in Rural Development: Exogenous, Endogenous and Neo-Endogenous Approaches," *Sociologia Ruralis* 54, no. 3 (2014): 249.

④ Christopher Ray, "Culture, Intellectual Property and Territorial Rural Development," *Sociologia ruralis* 38, no. 1 (1998): 4.

⑤ 赵志强、禹雪《新内生发展理论视域下职业教育赋能乡村人才振兴的逻辑与策略》,《中国人民大学教育学报》2024年第2期,第114页。

⑥ 杜焱强、詹昕颖《农村人居环境何以实现异质性治理?——基于外部资源和内在动力的解释》,《公共管理学报》2024年第4期,第153页。

⑦ 赵红、王新军《我国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推进研究——基于机制设计理论》,《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5年第3期,第103页。

⑧ 苏毅清、邱亚彪、方平《“外部激活+内部重塑”下的公共事务供给:关于激活乡村内生动力机制的解释》,《中国农村观察》2023年第2期,第74页。

⑨ 刘素娟《机制设计理论视野下的“学分银行”机制建设》,《教育发展研究》2014年第7期,第73页。

⑩ 程国平《经营者激励——理论、方案与机制》,经济管理出版社2002年版,第65页。

⑪ 范和生、郭阳《共同富裕背景下农村低收入人口综合帮扶机制建构》,《中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3年第1期,第146—147页。

机制在消除绝对贫困方面取得了历史性成就,但若继续采用这种方式,会造成基层政府行政资源浪费^①,抑制农村低收入群体内生动力。为此,在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过渡期,我国便开始探索以常态化帮扶为核心的治理模式,即不再把短期治理作为发展目标,而是将可持续发展作为整体战略导向,以培育农村低收入群体内生动力为突破口,构建常态化帮扶机制,从而有效减少外部资源浪费与农村低收入群体的资源依赖,实现帮扶政策的精准化和持续化。

2. “两项政策”由独立运行向衔接并轨的转变

2024年中央一号文件明确提出,“加快推动防止返贫监测和低收入人口动态监测信息平台互联互通,加强跨部门信息整合共享”^②。目前,大多数农村地区防止返贫帮扶政策和低收入人口帮扶政策(简称“两项政策”)仍然并行,防止返贫监测系统与低收入人口动态监测平台(简称“两库”)也相互独立,“两库”在监测内容、指标测量和认定标准等方面存在显著差异。“两项政策”的缺位或错位不仅会影响整体帮扶目标的实现,还会增加返贫致贫风险,而重合对象的过度帮扶则会产生负向激励,弱化农村低收入群体的内生动力,尤其是对有劳动能力的个体而言^③。林闽钢在全国各地农村的调查中发现,防返贫监测系统和低收入人口动态监测系统的对象重合率最低约为30%,最高约为60%^④。“两库合并”成为推动“两项政策”衔接并轨的突破口,不仅有助于打破各部门间的信息壁垒,提高整体治理能力,还有助于系统构建农村低收入群体常态化帮扶新格局,防止过渡期后可能发生的福利依赖性 or 系统性返贫问题,进一步凸显农村低收入群体的主体地位。因此,在过渡期后,随着帮扶政策的衔接并轨与优化调整,培育农村低收入群体新内生动力机制已成为贯彻落实常态化帮扶机制的政策要求。

(三)新内生动力机制培育的现实逻辑

1. 破解重点帮扶县发展基础薄弱的现实困境

国家乡村振兴重点帮扶县均位于我国海拔较高、地理位置偏远、交通不便的西部地区,是集地质灾害频发、革命老区和民族地区为一体的经济落后区域。该区域经济发展水平落后、可持续发展能力薄弱、生态环境脆弱等问题突出,大多为原深度贫困县。据统计,2022年重点帮扶县地区生产总值约占国内生产总值的1.25%,重点帮扶县一般公共预算收入仅占地方一般公共预算收入的0.52%左右^⑤,县域经济发展主要依靠政府财政转移支付及东西部对口支援。地处脱贫攻坚时期的14个集中连片贫困带,第二、三产业发展落后,同质化现象严重,先天条件不足导致重点帮扶县及农村低收入群体自我发展动力和能力普遍缺乏。尽管重点帮扶县占全国县级单位的比例不足6%,但累计脱贫人口却占全国总数的1/5,易返贫致贫人口约占全国的30%,返贫致贫风险高,防止返贫任务重^⑥。其中,易返贫致贫人口大多为偏远山区的农村低收入群体,劳动技能缺失、认知水平落后、综合素质偏低等个人禀赋特征,进一步加剧了其自我内生动力不足。

本文以国家乡村振兴重点帮扶县为例,探析农村低收入群体内生动力不足的内外成因及提升路径。在调研样本选取上,课题组分别于2021年和2022年,对更具复杂性、特殊性和典型性的民族地区乡村振兴重点帮扶县开展实地调研。其中,四川省和青海省内的所有重点帮扶县、甘肃省部分重点帮扶县均位于民族地区,目前仍是全国发展相对落后的地区之一。这些县多为藏族、汉族、回族等多民族聚居区,各民族在生活习惯、文化习俗、语言文字及价值观念等方面存在显著差异,多元社会结构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农村低收入群体的现代社会融入进程。具体调研范围涵盖四川省黑水县、红原县、若尔盖县、阿坝县4个县级单位,青海省和甘肃省5个县级单位(称多县、共和县、尖扎县、同仁市、临潭县),共计463户边缘易致贫群体。主要以问卷和访谈的形式开展,调研内容涉及家庭成员基本情况、教育水平、就业状况、宗教消费和帮扶成效感知等维度,旨在全面揭示农村低收入群体

① 卢飞、陆汉文《统合治理:县域脱贫攻坚的机制创新——基于贵州T县的经验研究》,《南京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2年第2期,第54页。

② 《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学习运用“千村示范、万村整治”工程经验有力有效推进乡村全面振兴的意见》(2024年1月1日),《人民日报》2024年2月3日,第1版。

③ 霍莹《以“并库”为突破口:两项政策衔接并轨的路径选择与政策集成》,《社会保障评论》2024年第5期,第103—104、106页。

④ 林闽钢《低收入人口常态化帮扶的整体性治理——基于“两项政策”衔接并轨突破口选取的考察》,《行政论坛》2024年第4期,第157页。

⑤ 数据来源:《中国统计年鉴2023年》,国家统计局官网, <https://www.stats.gov.cn/sj/ndsj/2023/indexch.htm>;国家统计局农村社会经济调查司编《中国县域统计年鉴(县市卷)2022》,中国统计出版社2023年版,第53—402页。

⑥ 程国强、马晓琛、肖雪灵《推进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的战略思考与政策选择》,《华中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2年第6期,第2页。

内生动力不足的共性与个性难题。

具体而言,大部分调研样本县的平均海拔高于3000米,恶劣的自然环境与高寒缺氧气候导致患有地方病(如大骨节病等)的农村低收入群体占14.41%,患有慢性病的比例为20.70%,造成其自我发展能力不足。样本中仍有55.85%的农村低收入群体不会讲普通话或不认字,封闭的语言环境及地区发展空间成为制约其对外交往的主要障碍。此外,滑坡、泥石流、地震等地质灾害频发,不仅造成了房屋、道路、农作物等物质财富的损失,还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农村低收入群体的发展信心。样本县属于民族地区,宗教信仰浓厚,不少农村低收入群体主要通过请喇嘛打卦、念经的方式来祈福消灾,甚至出现将政策补贴用于宗教消费、高额供奉等非生产性支出,显著抑制了农村低收入群体生活水平提高和生产发展能力提升。综上,受客观环境、传统文化等外部性因素制约,国家乡村振兴重点帮扶县农村低收入群体的自我意识、价值信念与行为动力普遍受限,长期如此便形成了生活态度懒散、生计方式落后、未来期望割裂的“生存型文化”^①。

2. 激活农村低收入群体内生动力面临的现实挑战

一方面,长期以政府为主导的资源投入和支付转移,不仅加重了政策获得者的“福利依赖”和“等要靠”等消极行为选择,还让边缘户群体产生了优惠政策的补偿心理,逐渐弱化其内生发展动力。调研样本中有16.92%的农村低收入群体对争当“建档立卡户”的现象表示赞同,其中边缘户和建档立卡户的比例分别为24.58%与11.70%,甚至有16.07%的边缘户群体因没有享受到帮扶政策而产生了心理不平衡。如在X县调研过程中一位村民说道:“自己是上门女婿,没有当地人的社会关系好,这种举手投票表决评定的方式是不公平的。建档立卡户的房屋修建有政府补贴,自己却要借钱修房。”这种不公平感直接弱化了行为个体的自我努力程度。另外,调研样本中有12.93%的农村低收入群体认为实现致富需要靠政府努力,有14.41%的农村低收入群体认为国家支持、干部帮扶是理所当然的,有4.26%的农村低收入群体在“要我富”和“我要富”中选择了“要我富”。这意味着其将希望过度寄托于政府和社会等外部力量,对帮扶政策认知的偏差导致其内生动力缺乏。综上,“运动式”的帮扶政策并没有从根本上消除农村低收入群体的返贫致贫风险,而以内生动力培育为导向的常态化帮扶机制构建有助于缓释帮扶政策所产生的负向激励作用。

另一方面,由于农村低收入群体整体教育水平、劳动技能和认知能力等要素禀赋积累不足,进一步强化了其消极的价值观念和自我弱化理念,从而表现出谋求发展型内生动力受损。在调研样本中,户主平均年龄为48.59岁,平均受教育年限仅为5.23年,现代教育的缺失导致农村低收入群体综合素质较低,普遍出现“不想参加、无力参与”的难题。另外,样本家庭具备劳动技能的仅占46.20%,未成年子女平均数量为1.01人,即劳动力数量和劳动技能的缺失是导致家庭“造血式”功能薄弱、生活现状改变动力不足的主要因素,甚至会造成适龄儿童延期入学或辍学的现象。尽管调研样本区各乡镇积极开展了理发、厨师、挖掘、种植(养殖)等职业技能培训活动,但仍有25.53%的农村低收入家庭没有参加相关培训,自我参与积极性低反映了其内生动力的不足,从而导致没有发展经营规划的家庭高达51.56%。综上,农村低收入群体内生动力提升的关键在于加强人力资本积累、提高劳动技能培训参与率,以帮助其重塑发展信心和发展动力。

3. 推动乡村全面振兴与共同富裕的现实需求

推进乡村全面振兴战略作为我国农业农村现代化的战略部署,是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重要历史任务。从国家乡村振兴重点帮扶县的实际情况来看,除劳动力外流导致的乡村参与主体缺失外,留守在农村地区的大多为相对弱势群体。由于该群体的主体能力与其主体地位不匹配,致使其难以有效参与公共事务和乡村治理实践。调研样本中,没有参与合作社组织的家庭占34.18%。因此,在过渡期后,亟须构建新的动力机制与乡村协同治理机制,系统性地培育农村低收入群体的新内生动力机制,持续提升他们的自我发展动力和内生能力。这不仅有助于激活农村低收入群体投身乡村全面振兴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还能增强该群体对乡村发展的认同感和归属感,助力乡村全面振兴战略的实施。

在乡村全面振兴与共同富裕战略交汇的关键期,如何确保农村低收入群体在物质和精神层面的双向富裕,已成为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及中国式现代化的核心目标。调研结果显示,家庭劳动力完全依靠务农、放牧、临时性

^①左停、李卓、赵梦媛《少数民族地区贫困人口减贫与发展的内生动力研究——基于文化视角的分析》,《贵州财经大学学报》2019年第6期,第87页。

工作等非正式就业的占比为 81.02%。尽管部分农村低收入群体通过挖虫草等方式获得了短期较高收入,但由于理财意识的缺乏,只注重当前消费,而忽视了后期收入来源,造成农村低收入群体收入不稳定、增收乏力及收入差距较大。在精神层面,发展意识薄弱、参与热情不足、思想观念落后等问题突出,成为制约农村低收入群体迈向共同富裕的突出短板。因此,要想共同富裕取得实质性的阶段性成果,关键在于解决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即必须培育农村低收入群体新内生动力机制,提升其可持续增收的内生发展动力和能力,才能让经济社会发展成果更广泛、更公平地惠及全体人民,实现全体人民物质富裕和精神富足。

三 新内生动力机制培育的范式分析

(一)农村低收入群体新内生动力机制的基本内涵

在传统的“施与受”帮扶机制中,外部干预力量通常会造农村低收入群体的独立思考能力、实践能力和主观能动性被削弱,并由此产生福利依赖效应和悬崖效应^①。学术界和政策制定者已意识到外部帮扶机制的局限,并提出激活农村低收入群体内生动力的发展目标。而事实表明,农村低收入群体内生动力不足的问题并没有从根本上得到解决。究其原因,在于单一的外部帮扶机制与内生动力机制均存在一定的局限性。自我发展能力和主体意识的欠缺,决定了农村低收入群体离不开政府、社会等外部力量的支持与帮扶,若完全脱离外部支持体系而空谈内生动力激活,无疑会陷入理想主义困境。因此,过渡期后持续提升农村低收入群体内生动力的关键在于培育新内生动力机制,即通过优化外部制度环境、提升农村低收入群体自主能力、激活其内在发展意愿,构建从“被动帮扶”向“主动发展”转变的长效机制。新内生动力机制突破了传统“输血式”帮扶机制的局限,涵盖了“造血式”内生动力机制的内涵,是由内外动力机制共同作用而构成的。综上,新内生动力机制是在融合新内生发展理论与机制设计理论上构建的联动型动力机制,既需要外部资源供给、制度环境优化等因素引发的动力机制,又强调在资源开发、乡村治理、产业发展中实现农村低收入群体的自主发展能力提升和角色定位转变的动力激发,最终实现农村低收入群体的内生动力全面激活。

(二)“上下联动+内外共生”新内生动力机制培育模式

基于新内生发展理论,本文构建了“上下联动+内外共生”新内生动力机制培育模式(见图 1)。其中,“上下联动”旨在构建一个共建共治共享的多元治理格局,“上”与“下”体现为不同层级主体间的有效联动。新内生发展理论认为,上下联动模式的高效运转离不开政府、市场和社会等外部主体的合理干预^②,通过政策制定、监督评估、统筹协调等自上而下的赋权方式,积极引导农村低收入群体形成自我发展意识。然而,由于不同主体间尚未达成统一的行动共识,单靠外部力量帮扶可能会削弱农村低收入群体的主体地位和主观能动性,从而造成福利依赖陷阱。这就要求帮扶机制向内生动力培育转变,以培育、提升和发挥农村低收入群体主体性为重点任务,健全完善市场主体和农村低收入群体的利益联结机制^③,并通过增强农村低收入群体的人力资本、社会资本、金融资本等自下而上的赋能方式,着重激发农村低收入群体潜在发展意识与行为动力,构建起多主体共同参与的多元治理格局。

此外,农村低收入群体内生动力的激活不仅依赖上下级主体间的有效联动,更需要上下级主体所提供的保障与支持,实现外部资源与内生动力的有机融合。“内外共生”强调外部资源与内部禀赋特征的高效适配,“内”与“外”体现为资源的优化整合与配置。基于新内生发展理论,内外共生模式的实现需要依托外部力量对资源进行由外而内的供给与配置,通过政策供给、技术支持、资源输入等方式,培育并激活农村低收入群体的内生发展动力。然而,外部资源投入的适度性与精准性难以衡量,外生资源的投入往往与农村低收入群体实际发展需求相脱节,难以实现外部资源与内生动力间的有效衔接。当外部资源供给不足或供给错位时,不仅会造成资源利用效率低下和资源浪费,还会产生外部资源与农村低收入群体内生动力不匹配。因此,农村低收入群体内生动力激活的关键在于如何将外部资源高效吸收并转化为内生发展能力,即通过由内而外的内部重塑,提升该群体对外部资源的接收、吸纳和转化能力^④,形成外部资源适度介入与内生动力有效激活的协同耦合机制。

① 林丛《城市居民低保制度“福利依赖”问题研究》,《学习与实践》2019年第12期,第93页。

② 姚佩欣、葛笑如《资源、规则、组织:新型农村集体经济发展的新内生解释——基于江苏省多案例研究》,《华中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4年第6期,第176页。

③ 高强、曾恒源《新时代以来的农村改革:成效经验、理论创新与深化方向》,《四川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4年第3期,第102页。

④ 杜焱强、詹昕颖《农村人居环境何以实现异质性治理?——基于外部资源和内在动力的解释》,《公共管理学报》2024年第4期,第162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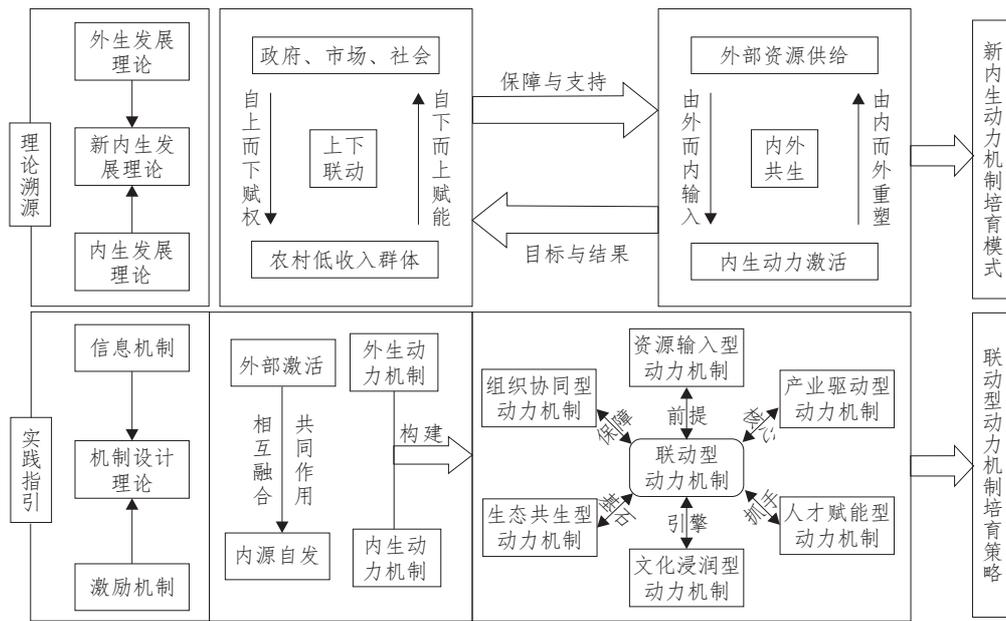


图1 农村低收入群体新内生动力机制培育模式及策略

(三)“外部激活+内源自发”联动型动力机制培育策略

为实现从外部输血赋能为主的动力机制向区域开发、个体能力提升与角色定位转变的联动型动力机制转变,本文结合国家乡村振兴重点帮扶县及其低收入群体禀赋特质,以信息机制和激励机制为实践指引,构建了由外部激活与内源自发相互融合与共同作用的联动型动力机制(见图1),希冀在内外生动力机制的混合路径中谋求国家乡村振兴重点帮扶县的整体性发展、资源高效开发和乡村有效治理。同时,建立与农村低收入群体紧密相联的利益联结机制和行为导向机制,强化其发展需要、发展动机与行为动力的可持续性。

第一,“资源输入型动力机制”是新内生动力机制培育的前提。新内生发展理论认为,外部力量帮扶是激活农村低收入群体内生动力的必要前提。国家乡村振兴重点帮扶县农村低收入群体因地域发展滞后、劳动技能欠缺、内生动力不足等个体发展瓶颈,难以依靠自身力量实现可持续发展。基于此,构建系统性、常态化和动态化的发展型社会政策,既能为农村低收入群体提供兜底保障,又能强化其主体地位,推动构建多元协同治理,从而避免福利依赖,增强农村低收入群体内生发展意愿和自我发展意识。

第二,“产业驱动型动力机制”是新内生动力机制培育的核心。实现产业经济的自主性与内生性是复合型内生动力运转的核心驱动力^①。然而,国家乡村振兴重点帮扶县现代化产业链条短、水平低,难以有效激发农村低收入群体的增收致富热情。因此,基于重点帮扶县的区域特征和民族特色,构建以现代农业为核心驱动力的新质生产力,既能提高生产效率、延长产业链、降低生产成本^②,又能通过培育新型农业经营主体、促进非农就业等方式^③,为农村低收入群体创造更多的经济效益。在此基础上,构建新型农村集体经济与农村低收入群体协同发展的利益联结机制与参与机制,可以拓宽农村低收入群体的收入来源,形成“产业驱动—利益共享—主体激活”的良性循环。

第三,“人才赋能型动力机制”是新内生动力机制培育的重要抓手。国家乡村振兴重点帮扶县农村低收入群体面临劳动条件与劳动能力不足的双重束缚,导致该群体成为发展难度较大的群体。因此,除完善外部劳动条件外,加强人力资本投资、提升劳动能力将成为激发农村低收入群体内生动力的关键。通过基础性技能和专业性技能的培训,可以提高农村低收入群体生计资本积累、增强市场竞争力及持续增收能力,调动其劳动市场参与积极

①蒙慧、刘光旭《“内生发展”:民族地区以乡村全面振兴迈向共同富裕的现实路径》,《广西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4年第5期,第116页。

②杨文博、李照晗《农业新质生产力、农民收入增长与收入分配效应》,《郑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4年第6期,第57页。

③黄斌、孔祥智《农业新质生产力赋能农民增收:理论机制与实践路径》,《中国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5年1月6日网络首发,第7页, <https://doi.org/10.13240/j.cnki.caujsse.20250106.005>。

性和主动性。此外,依托劳动市场参与中的“干中学”机制,能在实践中不断提高农村低收入群体的发展潜力和自我发展能力,有效引导并激发其内生动力。

第四,“文化浸润型动力机制”是新内生动力机制培育的引擎。文化引领是充分激活农村低收入群体内生发展动力的“软实力”,能够为其提供强大的精神支撑和精神动力。然而,在传统文化、陈规陋习和宗教消极教义的影响下,国家乡村振兴重点帮扶县农村低收入群体的自我发展动力严重受阻。因此,只有传承与弘扬优秀传统文化,深度挖掘红色文化资源(如红军长征精神等),融合多民族文化精华,才能增强农村低收入群体的文化自信和文化认同,重塑其价值观念和理想信念,从而增强发展自信心和提高发展动力。

第五,“生态共生型动力机制”是新内生动力机制培育的基石。国家乡村振兴重点帮扶县是我国资源富集区,蕴含着丰富的土地、水、矿产等自然资源,以及独特的民俗文化资源和特色旅游资源。同时,该地区也是生态环境脆弱区,极易因人为过度开发引发水土流失、森林火灾、土壤贫瘠等问题,进而制约传统种植业和畜牧业的发展。因此,在生态宜居战略目标引导下,将该区域的生态资源、旅游资源和文化资源进行绿色市场化与生态资本化运作,可以助推资源节约、生态保护、产业结构转型与经济增长共赢,为农村低收入群体提供良好的生态环境。通过生态产品价值转化进一步为农村低收入群体及后代提供更多的就业、创业和增收机会,在可持续发展中帮助农村低收入群体形成长远的发展眼光和全局发展意识。

第六,“组织协同型动力机制”是新内生动力机制培育的保障。乡村治理体系作为农村低收入群体内生动力提升的保障,承载着重要的社会、经济和文化价值。然而,国家乡村振兴重点帮扶县乡村治理面临着治理主体缺位、治理能力不足和治理手段滞后等问题,严重制约了乡村全面振兴战略的实施。对此,加快推动乡风文明建设、乡村治理体系完善与治理能力现代化成为当务之急。过渡期后,乡村发展环境优化、资源开发加速利用、时代新风貌培育、多元治理格局重构、参与治理平台健全等^①,是切实提升农村低收入群体参与乡村治理积极性、唤醒其乡村发展认同感和归属感的重要途径,能够推动其角色定位转变、增强其主体地位。

四 新内生动力机制培育的实现路径

(一)发展型社会政策的嵌入与引导

一方面,除完善国家乡村振兴重点帮扶县基础设施建设、基本公共服务等外部环境外,更为重要的是精准识别与划分不同类型的农村低收入群体。对劳动技能欠缺、语言掌握较差、年龄偏大、外来流入人口等个体禀赋各异的农村低收入群体进行开发式帮扶,坚决杜绝关系户或非公平竞争等行为。另一方面,发展型社会政策突出强调公民的社会责任。在“外部嵌入—内生发展”的理论框架下,单靠政府力量是有限的,亟须市场、社会等非政府组织的介入,切实保障农村低收入群体的参与权、决策权、监督权和管理权,增强其个体身份认同感和参与感,构建以政府为主导、社会力量助推、市场机制运作和农村低收入群体参与的多元治理格局。此外,在给予农村低收入群体最低生活保障的同时,要善用乡村广播、村刊村报、网络媒体、村干部入户等多元化渠道,以通俗易懂的方式做好帮扶政策解读工作,确保农村低收入群体对帮扶措施的理解准确到位;积极开展致富能手、劳动模范等先进个人评选活动,营造奋发向上的良好风尚,降低农村低收入群体对帮扶政策的依赖,强化其自我发展意识。

(二)农业新质生产力的驱动与赋能

农业新质生产力的核心在于催生以创新要素、先进技术和新理念为引领的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②。国家乡村振兴重点帮扶县应立足当地禀赋优势,培育特色种植养殖业、民族手工业、生态旅游和农文旅融合等新兴产业,通过延长产业链和价值链的方式,增加就业岗位和就业机会,带动农村低收入群体全产业链参与生产经营活动,调动其生产积极性。在此基础上,积极扶持专业合作社、龙头企业、家庭农场等新型农业经营主体,鼓励工商资本下乡发挥引资效应和增收效应,拓宽农村低收入群体增收渠道。同时,发展壮大新型农村集体经济,通过入股份额、资源投入和劳动参与等多元路径,构建与农村低收入群体的利益联结机制,促进个体收入与区域发展协同提升,让农村低收入群体切实感受到有所盼、有所望。另外,农业新质生产力将大数据、人工智能、云计算等数字技术与农业生产全链条深度融合,助推了农业的高质量发展。因此,需加大对高山蔬菜、青稞、松茸、川贝、牦牛等特色种植养殖业的数字技术投入,通过智慧农业、信息服务和电子商务等关键环节的投入,着力打造农产品精

^①罗明忠、魏滨辉《乡村治理、社会资本与农村收入差距》,《中国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3年第6期,第133页。

^②张力一期《新质生产力驱动民族地区乡村产业高质量发展的逻辑与路径》,《云南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4年第4期,第155页。

深加工、智慧农业与设施农业等现代化农业产业,降低气候变化、地质灾害、病虫害等外部因素可能带来的减产效应,充分激发农村低收入群体的劳动热情和发展信心。

(三)个体人力资本的提升与积累

发展型社会政策主张对人力资本进行投资^①。对国家乡村振兴重点帮扶县农村低收入群体而言,首先应开展普通话学习和认字教育,以儿童和青年人为核心带动中老年人通用语言能力和对外交往能力的提升。其次,关注个体禀赋差异和实际发展需求,积极开展新农人培育、劳动技能培训、数字技术采纳等教育活动,通过夜校培训、错季培训、云课堂培训等方式提高培训的灵活性,增加农村低收入群体的培训参与率。对从事以农业为主的农村低收入群体,积极开展作物育种、种植(养殖)技术采纳、病虫害防治等培训;对从事以非农为主的农村低收入群体,应围绕家政服务、物流配送、餐饮旅游等不同行业开展职业技能培训,通过“授人以渔”的开发式帮扶方式充分提升有劳动能力的农村低收入群体的增收致富能力,从而构建起与新兴产业相适配的高素质人力资源支撑体系。再次,在数字经济时代背景下,数字技术的广泛应用对农村低收入群体的劳动技能水平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因此,应积极开展电商直播、在线教育、社交媒体营销等数字素养培训活动,对年龄偏大和教育水平较低的农村低收入群体,实施“适老化”和“适弱化”的数字包容发展策略,降低数字技术使用门槛,改变“我老了”、“我不会”等自我否定意识,真正实现数字技术赋能,增强农村低收入群体内生发展潜力与发展动力。

(四)优秀传统文化的弘扬与革新

深厚的历史文化底蕴和独特的民俗传统为国家乡村振兴重点帮扶县的文化资源开发与应用提供了支撑点。一是要充分发挥传统习俗和乡土文化“以文化人”、“以文育人”的作用,通过观看微电影、实地参观、经典诵读等喜闻乐见的方式,大力弘扬红色文化和优秀民俗文化,有效发挥社会规范与心理调适的正向引导作用,为激发农村低收入群体内生动力提供强大的精神根基。同时,积极引导农村低收入群体树立理性的宗教消费观念,鼓励其将资金用于人力资本投资、生产经营投资等方面,以资源优化配置激活内生发展潜能。二是将民族地区传统文化与当地旅游产业紧密结合,通过打造沉浸式红色旅游景区、开发特色文创产品和改建民族文化主题民宿等新业态,形成“文化+旅游”的产业耦合效应,充分激发农村低收入群体财富创造热情。三是在民族融合发展的时代背景下,不仅要做好本土优秀传统文化的保护传承,更要增强与外界的交流融通,融合创新其他优秀民族传统文化成果,为激发农村低收入群体内生动力提供“催化剂”。

(五)生态资源价值的挖掘与转化

在开发利用国家乡村振兴重点帮扶县自然资源时,应秉持绿色发展理念和科学保护原则,基于主体功能区的战略定位,重点发展清洁能源、生态农业、生态旅游等绿色经济和绿色产业,加大对生态脆弱区和重点保护区的生态补偿力度。其中,打造生态经济的关键在于完善绿色基础设施建设、优化产业结构布局、强化绿色金融支持、加快绿色技术推广等,切实提升农村低收入群体的生活质量和健康水平。此外,丰富的自然资源禀赋和文化底蕴为国家乡村振兴重点帮扶县的旅游业发展提供特色化和多元化优势,亟须深入挖掘其旅游资源的价值潜力。通过加大资金与政策投入,推进旅游景区、交通基础设施及公共服务设施建设,重点培育生态旅游、森林旅游、观光旅游等特色旅游业态,将地理劣势转变为旅游优势,塑造具有地域特色的旅游品牌,为农村低收入群体创造更多就业渠道与增收机会,激发个体主动性和创造性。

(六)乡村治理体系的重构与优化

一方面,乡风文明建设是农村低收入群体精神文化素质提升的基石。应通过文明乡风培育、移风易俗引导、村规民约规范等精神文明建设,提升农村低收入群体在日常生活中的文明凝聚力。采取积分制或以奖代补的激励手段,鼓励并组织农村低收入群体参与公共事务管理与乡村治理活动,解决人力资源匮乏、“空心化”现象加剧以及“无人治村”等治理主体缺位的困境,增强农村低收入群体的主体责任感。另一方面,基层组织建设薄弱、村干部综合素质有待提升及治理主体老龄化等是乡村治理能力不足的主要原因。基于此,乡村治理应始终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充分发挥基层党组织核心作用,健全自治、法治和德治相结合的基层治理体系;进一步拓展基层组织与农村低收入群体间的协商协同和参与机制,增强农村低收入群体的主体地位和自我认同。此外,数字基

^①公衍勇、聂淑亮《“后小康时代”社会救助制度的调整优化——基于发展型社会政策视角》,《湘潭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1年第5期,第101页。

基础设施建设不完善以及乡村治理中数字技术应用能力不足,造成了乡村治理手段落后。为提升乡村治理现代化水平,需紧跟数字化与现代化的发展趋势,完善国家乡村振兴重点帮扶县的乡村数字基础设施建设,广泛应用互联网、大数据、区块链等前沿信息技术赋能乡村治理工作。同时,还应切实提升农村低收入群体的数字技术掌握与应用能力,以增强其个体行为动力。

五 结论与展望

(一)主要结论

在兜底型社会政策的帮扶过程中,国家乡村振兴重点帮扶县农村低收入群体普遍存在内生导向模糊、内生动力不足和内生能力薄弱的现实困境,为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和乡村全面振兴战略实施带来了挑战。过渡期后,培育农村低收入群体新内生动力机制已成为常态化帮扶的根本点和着力点。本文从理论逻辑与现实逻辑揭示了新内生动力机制培育的重要性和必然性。这不仅有助于推动乡村全面振兴战略与共同富裕发展目标的实现,还对推进中国式现代化、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具有现实意义。在新内生发展理论的指导下,本文提出了“上下联动+内外共生”的新内生动力机制培育模式;并运用机制设计理论,构建了“外部激活+内源自发”联动型动力机制培育策略,以期在区域开发、个体自我发展能力提升和角色定位转变的互动融合中发挥整体性合力,从而最大限度地释放农村低收入群体蕴藏的内生动力。

为解决农村低收入群体内生动力缺乏的现实困境,本文提出相应的政策启示:宏观层面,应瞄准农村低收入群体,继续完善现有的社会保障、社会救助、社会福利等普惠型服务体系,着重防范区域系统性风险;中观层面,以农业新质生产力为导向,从产业发展、资源开发和乡村治理等维度促进国家乡村振兴重点帮扶县的可持续发展,形成对农村低收入群体的“涓滴效应”;微观层面,从内生动力提升的角度优化设计,包括稳定的利益联结机制、匹配的职业技能培训、丰富的精神文化活动等一系列激励引导长效机制。

(二)研究展望

本文立足于过渡期后新的历史方位,系统构建了国家乡村振兴重点帮扶县农村低收入群体新内生动力机制培育的“模式—策略—路径”。这为全面激活农村低收入群体内生动力提供了有效方案,更是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扎实推进共同富裕进程的重要实践探索。但本文仍存在以下一些不足。第一,受新冠疫情的影响,国家乡村振兴重点帮扶县的调研样本数据较少,且采用的是问卷调查和访谈的形式收集,可能存在一定的主观性,并不能全面刻画不同区域农村低收入群体的现实困境与发展难题。第二,由于不同类型、区域的农村低收入群体面临的风险冲击不同,本文并没有针对不同类型的农村低收入群体(如劳动技能缺失、劳动条件不足等)展开深入讨论,可能会造成帮扶错位及无效治理。因此,在未来研究中,可以通过进一步扩大调研样本,补充必要的案例分析和实证数据,结合定量和定性分析方法,深入探讨农村低收入群体内生动力的现实情况、影响因素及提升路径,从而增强研究结论的广泛性和普适性;在精准识别与准确划分农村低收入群体不同类型的基础上,提出更具针对性、操作性的建议,逐步推进农村低收入群体迈向共同富裕。

[责任编辑:钟秋波]

models for economically disadvantaged villages. Critical measures entail integrating foundational security with developmental assistance, coordinating universal support with differentiated policies, and optimizing assistance strategies in social security, industrial employment, infrastructure, and public services through systematic adjustment and innovation.

Keywords: rural low-income populations; underdeveloped regions; regularized assistance; common prosperity; rural revitalization

Cultivation of a New Endogenous Motivation Mechanism for Rural Low-Income Groups After the Transition Period: A Case Study of National Key Counties for Rural Revitalization Assistance

Zhang Huaquan¹, Yang Fan²

1. College of Economics, Sichuan Agricultural University, Chengdu, Sichuan, China

E-mail: zhanghuaquan@sicau.edu.cn

2. College of management, Sichuan Agricultural University, Chengdu, Sichuan, China

Abstract: As the subjects of relative poverty governance in underdeveloped areas, the rural low-income groups in the national key counties for rural revitalization assistance generally faces the practical difficulties of ambiguous endogenous orientation, weak endogenous capacity, and insufficient endogenous motivation during the implementation of the current safety-net social policies in the transition period. This poses potential risks and challenges to consolidating and expanding the achievements of poverty alleviation and implementing the comprehensive rural revitalization strategy. After the transition period, fully stimulating the endogenous motivation of the rural low-income groups has become the fundamental focus and policy starting point of regularized assistance, the key to which lies in cultivating a new endogenous motivation mechanism. By systematically reviewing the theoretical, historical, and practical logic of cultivating this new mechanism, the necessity and importance of its cultivation are revealed. That is, by optimizing the external institutional environment, enhancing the spontaneous capacity of the rural low-income groups, and activating their intrinsic willingness, a long-term mechanism for shifting from passive assistance to active development can be established. Therefore, based on the new endogenous development theory framework, integrating traditional exogenous and endogenous development theories, a cultivation model of “top-down linkage + internal-external symbiosis” is proposed, aiming to achieve a diversified governance pattern and efficient adaptation of internal and external resources. Guided by the practice of mechanism design theory, and relying on information and incentive mechanisms, a linkage-type motivation mechanism cultivation strategy of “external activation + internal spontaneity” is constructed. It is hoped to seek the overall development, efficient resource development, and effective rural governance of the national key counties for rural revitalization assistance through a mixed path of internal and external motivation mechanisms. At the same time, it aims to establish a benefit-linking and behavior-guiding mechanism closely connected with the rural low-income groups, and to further strengthen the sustainability of their development needs, motivations, and behavioral drives through the trickle-down effect. Specifically, it involves constructing a linkage-type motivation mechanism that integrates a

resource-input-type mechanism, an industry-driven mechanism, a talent-empowerment mechanism, a culture-infiltrating mechanism, an ecological-symbiosis mechanism, and an organization-coordination mechanism. Corresponding implementation paths and policy recommendations at the macro, meso, and micro levels are proposed accordingly. In summary, the new endogenous motivation mechanism can not only enhance the endogenous development motivation and capacity of the rural low-income groups, reduce the welfare dependency effect and the risk of returning to poverty, but also provide sustainable endogenous development momentum for achieving the strategic goals of comprehensive rural revitalization and common prosperity.

Keywords: after the transition period; rural low-income groups; new endogenous motivation mechanism; national key counties for rural revitalization assistance

Rural Land System Reform to Promote Urban-Rural Integrated Development: Multiple Logics and Exploratory Paths

Hong Mingyong, Jiang Yue

School of Economics, Guizhou University, Guiyang, Guizhou, China
E-mail: hongmingyong@163.com

Abstract: The integrated development of urban and rural areas is an inevitable path for Chinese modernization, embodying multiple requirements such as reform and innovation, coordinated advancement, green ecology, open interaction, and shared achievements. At the theoretical logic level, the reform of the rural land system provides a solid institutional foundation for integrated urban-rural development through the rural land property rights system, the circulation of rural land management rights (use rights), rural land use planning, rural land ecological protection, and the value-added benefits and distribution of rural land. At the historical logic level, the reform of the rural land system has undergone an evolutionary process from “farmer private ownership to collective ownership, then to separation of two rights and finally to separation of three rights”, which has had an important impact on urban-rural relations at different stages and provides a historical basis for promoting integrated urban-rural development in the new era. At the practical logic level, the rural land system has played an important role in shoring up the shortcomings of agricultural and rural modernization, solving the dilemma of urban-rural imbalance, and reshaping industrial-agricultural and urban-rural relations, but it still faces deep-seated institutional constraints. To promote integrated urban-rural development through the reform of the rural land system, it is necessary to focus on key links such as “expanding rights”, “guiding flows”, “reshaping”, and “coordinating”: relying on land property rights reform to promote the two-way flow of urban and rural elements, activating the land circulation market to promote the optimal allocation of urban and rural resources, improving the income distribution mechanism to help share the results of urban and rural development, and scientifically planning the land use pattern to promote the complementary functions of urban and rural areas.

Keywords: reform of the rural land system; urban-rural integrated development; “theory-history-reality” triple logic